



鼓楼史学丛书·海外中国研究系列

德国汉学家 福兰阁论中国

黄怡容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鼓楼史学丛书·海外中国研究系列

德国汉学家 福兰阁论中国

黄怡容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德国汉学家福兰阁论中国/黄怡容著.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7. 6

ISBN 978-7-5203-0041-4

I. ①德… II. ①黄… III. ①汉学—研究—德国IV. ①K207.8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054352号

出版人 赵剑英
责任编辑 张 湑
责任校对 李 莉
责任印制 李寡寡

出 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158号
邮 编 100720
网 址 <http://www.csspw.cn>
发 行 部 010-84083685
门 市 部 010-84029450
经 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印 刷 北京明恒达印务有限公司
装 订 廊坊市广阳区广增装订厂
版 次 2017年6月第1版
印 次 2017年6月第1次印刷

开 本 710×1000 1/16
印 张 15.5
字 数 232千字
定 价 58.00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营销中心联系调换

电话: 010-84083683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内 容 简 介

本书以近代著名德国汉学家福兰阁为研究对象，以德文原始档案史料为依凭，试图系统解读福兰阁的中国观。福兰阁是德国汉学界，乃至整个西方汉学界的重镇，其人对中国历史、文化，以及晚清中国的外交内政有着独到的理解，也对德国政学两界有着重要的影响力。本书拟从福兰阁视野中的中国历史、儒家文化、晚清中国与西方的关系以及晚清内政四个维度，并结合福兰阁人生际遇，系统解读福氏之中国观，希求管窥近代德国汉学研究的一般特征。引玉之砖，难免粗陋，俯请学界前辈方家不吝指正。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 (14YJC770011)

目 录

绪论	(1)
第一章 从外交官到汉学家	(20)
第一节 小学、中学和大学时代	(20)
第二节 外交官生涯	(26)
第三节 汉学家活动	(39)
第二章 福兰阁有关中国的著述	(65)
第一节 游记	(65)
第二节 新闻报道	(70)
第三节 学术论文、译著和专著	(79)
第三章 福兰阁的中国历史观	(91)
第一节 发展而非停滞,相通而非孤立	(91)
第二节 普世国家而非民族国家	(102)
第三节 中国作为一个“文化大国”	(119)
本章小结	(127)



第四章 福兰阁的中国儒学观	(129)
第一节 福兰阁视野中的西方儒学研究	(129)
第二节 从儒学到儒教:儒家学说的宗教化	(137)
第三节 尊法反儒	(144)
第四节 共和还是儒教	(148)
本章小结	(152)
第五章 福兰阁论 1842—1903 年的中国与西方关系	(154)
第一节 关于中日甲午战争和俄德法三国“干涉还辽”	(155)
第二节 关于列强的对华文化政策	(167)
第三节 西方应当如何与中国打交道	(179)
本章小结	(186)
第六章 福兰阁论晚清政治	(188)
第一节 关于戊戌变法的起源、过程和结果	(188)
第二节 关于中国不同政治集团之间的斗争	(204)
第三节 关于清末新政	(206)
本章小结	(219)
结语	(221)
参考文献	(227)
后记	(241)

绪 论

一 选题缘起与意义

(一) 选题缘起

德国当代汉学家裴古安 (Andreas Pigulla) 把自 15 世纪到 18 世纪这一时期欧洲人对中国古典文献的翻译、对中国的描述、对中国语言文学和历史文化的研究统称为“前汉学”(Protosinologie)^①, 其突出特点是: 除了个别商人(如马可·波罗)之外, 传教士是与中国接触和研究中国的主体; 传教士对中国的研究完全出于他们的传教策略需要, 他们翻译中国经籍、介绍中国历史文化和社会现实, 但探讨的重点是宗教问题; 欧洲学者的中国知识主要来自传教士的翻译和著述, 他们同耶稣会传教士一样, 对中国人的伦理道德观念和社会生活表示赞赏, 但多有理想化和虚构的成分。科学的研究尚付阙如。

进入 19 世纪, 汉学研究在德国兴起, 但最初多为业余爱好者所为, 故有“业余爱好者的汉学”(Amateur Sinologie)之称^②。至 19 世纪下半叶, 学术性汉学研究开始出现, 但最初仍隶属于东方学, 并且

^① [德] 裴古安:《德语地区中国学历史取向的起源》, 韦凌译, 载 [德] 马汉茂、汉雅娜著, 张西平、李学涛主编《德国汉学: 历史、发展、人物与视角》, 大象出版社 2005 年版, 第 95—130 页。

^② Otto Franke, “Die Sinologischen Studien in Deutschland”, *Ostasiatische Neubildungen*, 1911, p. 358.



与印度学和犹太学相比，仅处于边缘地位。^① 1887年，柏林大学成立了东方语言研究所（Seminar für Orientalische Sprachen），但主要以培养掌握实用语言的人才为目的。

另一方面，在重商主义、欧洲中心论和欧洲优越论等社会思潮的影响下，德国知识界对中国历史文化的的评价发生了重大变化，从积极肯定转变为批判否定。哲学家黑格尔（Georg Wilhelm Friedrich Hegel, 1770—1831）谴责中国为守旧落后的化身，认为中国社会已经丧失了发展的动力，中国没有历史，只有王朝的循环发展，中国还处于“世界历史之外”^②。历史学家兰克（Leopold von Ranke, 1795—1886）也把中国人归入“永远静止”的民族之列，认为他们对世界历史毫无贡献。汉学研究纯属多余^③。

汉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直到20世纪初才得以建立。1909年，汉堡殖民学院设立东亚语言和历史研究所，曾在德国驻华公使馆工作13年之久的福兰阁出任首位汉学教授。1912年，柏林大学也设立了汉学教席。1919年，汉堡大学成立，东亚语言和历史研究所一分为二，中国语言与文化研究所和日本语言与文化研究所均成独立建制，汉学也成为了独立学科。稍后，在1922年，莱比锡大学成为德国汉学的又一重镇，著名的东方学家孔好古（August Conrady, 1864—1925）正式担任汉学教授。1924年，法兰克福大学成立中国研究所，由早已以翻译中国古典作品闻名于世的传教士卫礼贤（Richard Wilhelm, 1873—1930）掌门。

与此同时，中国历史文化在西方社会再度受到了高度重视。不少知识界人士出于对西方占统治地位的世界观和价值观的反感和对机器文明的厌恶，重新把眼光转向了东方，对中国文化的积极意义产生了

① [德] 傅海波：《欧洲汉学简评》，胡志宏译，《国际汉学》2002年第7辑，第83页。

② [德] 黑格尔：《历史哲学》，王造时译，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年版，第75页。

③ Otto Franke, “Die sinologischen Studien in Deutschland”, *Ostasiatische Neubildungen*, 1911, p. 368.



新的认识。而那些因为各种各样的机缘，成为中国研究专家的学者们则致力于向包括德国在内的西方社会传播中国文化，并为汉学学科的建立和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

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德国汉学家群体中，福兰阁^①无疑是一位杰出的代表。他是德国第一个汉学教席的首任教授，也曾在汉堡大学和柏林大学任教，还担任过汉堡学者联盟主席、柏林高等学校协会主席、普鲁士科学院院士、哥廷根科学院荣誉院士。他在1888年来华担任外交译员后，就对中国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并开展了广泛深入的研究工作。回到德国后，他长期在大学任教，培养出了很多后来也成为德国汉学研究的栋梁之材的学生。终其一生，他写作并发表有关中国的著述二百余种，对中国历史文化和现实政治作出了全面而又系统的阐释，至今仍颇具影响。完全可以说，福兰阁是德国大学近代汉学学科的最重要奠基人之一，其生平事迹和学术贡献很值得研究。本书试以他的原著为基础，对其有关中国的论述做专门考察。

（二）选题意义

研究福兰阁对中国的论述不仅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也很有现实意义。

其一，19世纪末20世纪初是德国汉学学科的创立时期，在这一时期，汉学学科正式的从东方学中分离出来，开始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出现在德国大学，有大量论述中国的游记、新闻报道、中文古典作品的德译本和有关中国的研究性著作问世，也有各种各样的看法和观点呈现。作为这一时期的一位重要汉学家，福兰阁的著作和论述在许多方面都具有奠基意义，研究福兰阁对中国的论述，对于了解德国的汉学发展史是非常重要的。

其二，在这一时期，在德国社会，汉学家已成为研究和传播中国

^① 福兰阁是他的中文名字，音译为奥托·弗兰克，另有中文名作福兰格、傅兰克、弗兰克。



文化主体，而在当时的汉学家当中，其社会经历和学术实践又各有春秋，有的是从东方学家转变为汉学家的，有的是从传教士转变为汉学家的，还有的是从外交官转变为汉学家的。不同类型的汉学家，在研究志趣、研究重点和学术观点等方面自然有许多不同。在从外交官转变为汉学家这一类型的中国研究者当中，福兰阁也堪称代表。研究福兰阁对中国的论述，不仅可以使人更加深入地了解外交官—汉学家的独特视角和见解，也可以弥补被其他类型的汉学家所忽略的内容。

其三，19世纪末20世纪初，就西方主要国家而言，总体上还是处于帝国主义阶段，其主流思想还是对中国持歧视态度的，或者是否定中国文化进步性和现实意义，或者是从种族主义立场出发，污蔑中国是“黄祸”。福兰阁对中国的论述总体上是与主流话语背道而驰的，在许多方面也是对主流观点的一种批判和纠正。研究福兰阁对中国的论述，可以使人们看到一种对中国充满同情和热爱的观点，并由此对所有与福兰阁持同样观点的西方汉学家产生无限的敬意。

其四，尽管大背景是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侵略，但不可否认的是，自19世纪60年代以来，中德两国之间的联系越来越多，中德文化交流也越来越频繁，关注中国、研究中国、论述中国的作家和作品更是不断增加。福兰阁对中国的论述也是中德文化交流的一个缩影，研究这一缩影可以深化人们对中德文化交流的认识。

其五，福兰阁对中国的论述涉及历史文化、学术思想、中外关系和现实政治等诸多方面，是在充分掌握资料并对中国有密切的亲身体验和理论思考的基础上形成的，虽然有些观点不可避免地带有时代烙印和历史局限，个别思想已显陈旧，甚至是成问题的，但大多数相当精辟，至今仍耐人寻味。研究福兰阁对中国的论述，不仅可以使我们了解到一位资深的、德国研究者对于中国的评论，也可以使我们获得许多进行自我反思的宝贵素材。

其六，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方，包括德国汉学界对中国文化的研究与评价，对当时的中国社会产生过一定积极影响，对当时知



识界的本国文化信念的重新建立起到过一定的作用。因此，现在重新检视那一时期德国汉学家在德国所做的中国文化传播，有着很强的现实意义，有助于重建社会的本国文化信念，亦有助于中国文化外交的开展。

二 学术史回顾

到目前为止，中外学术界尚无研究福兰阁论中国的专著，相关研究虽然已有一定数量，并且对于本书的写作不乏借鉴意义，但就其内容和观点而言，也存在着不少问题，兹梳理评介如下。

（一）国内研究状况

中国学者最早的有关福兰阁的评论，大概是徐道临 1931 年在《中国》（*Sinica*）杂志上发表的一篇文章^①。徐道临是民国时期的著名法学家之一，30 年代初曾就读于柏林大学。他在文章中对福兰阁著《中华帝国史》一书进行了批判分析。在他看来，中国文化很大程度就是儒家文化，中国人的认知和生活方式跟孔子思想密不可分，而福兰阁想写一部“脱离儒家”的中国历史无异于空想；福兰阁写作《中华帝国史》的主导动机是反对儒家学说、诽谤中国和中国人；福兰阁的著作特点是“所有他想要驳斥和否定地出现在中国历史中的东西，正是那些中国人视作好的和令人尊敬的东西，所有他想要强调和突出的东西，都是适合于证明中国人作为人是没能力的，道德上是劣等的东西”^②。这一批评是相当严厉的，但在后来并没有为中国学者广泛接受。我们也认为有些偏颇。在历史上，儒家学说虽然长期占据主导地位，但把中国文化等同于儒家文化，则有失于片面。这种片面性恰恰是福兰阁要予以纠正的。在他看来，在中国历史上，儒家学说虽然影

① Hsü Dau Lin, “Rez. : O. Franke 1930”, *Sinica*, 1931.

② *Ibid.*, p. 128.



响巨大，但也只是塑造和统治中国国家和中国社会的众多力量之一，并且同任何一种力量一样，儒家学说的力量也是有其时间限制的。曾经有过这样的时期，在那里，儒家学说尚未出现；也有这样的时期，在那里，儒家学说已经不再存在。因此，当福兰阁考虑为中国历史分期的时候，他首先列举了一个“前儒学时期”（古代），在这个时期，孔子和儒家学派还没有诞生，中国人的国家思想和国家却早已出现和形成，儒家学说只是对这个思想的继承和发扬。儒家学说自汉代起始成为官方学说，经过宋代新儒学的教条化，其在中国的统治地位得到了进一步巩固，直到19世纪末，随着中华帝国的崩溃，才退出历史舞台。而在近代，中国人的精神生活在某些方面重新接近了在儒学体系发挥作用之前时代的状态，百家争鸣，百花齐放，各种各样的学术和思想流派竞比高下。由此可见，在中国，除了儒家学说，肯定还有其他力量。儒家学说虽然是强大的力量，但决不是唯一的力量。^①因此，编纂中国历史必须超越儒家学说，要有更远大和更宽广的视野。我们认为这种主张可谓精辟之见，很值得深思。

至于徐道临的有关福兰阁“诽谤中国和中国人”的指控，我们认为也有些过度情绪化，从福兰阁的著述中，我们感受到更多的是对中国的同情和理解，以及对中国文化的热爱。诚然，作为一名学者，福兰阁很富有批判精神，但是他不仅批判中国在历史上和现实中存在的、在他看来是错谬的思想观念，也批判西方社会对中国的种种误解。他的批判是一种学术性的，是应当予以认可的。

徐道临的批评意见虽然不能被我们完全接受，但它毕竟是有一定的研究深度的。在他之后，虽然也有中国学者关注到福兰阁，但仅仅在翻译介绍方面做了些工作，迄今尚未见到真正有学术含量的研究性著作。就是认真阅读过福兰阁著作的人恐怕也不多。这不能不说是一

^① Otto Franke, *Geschichte des chinesischen Reiches*, Bd. 1, Berlin: W. de Gruyter & Co., 1930, p. XVIII.



件憾事。

对于福兰阁作品的翻译，在 20 世纪 30 年代就开始了。当时的翻译者有朱炳荪、杨丙辰、程明洲、关琪桐、胡隽吟、李相显和吴兴华等人。被翻译成中文出版的福兰阁的作品则有：《中国历史学的要质》（*Das Wesen der chinesischen Geschichte*）、《现下德国之中国学》（*Die Sinologie in Deutschland*）、《十六世纪中国之思想斗争》（*Der Chinesische ideologische Kampf im 16. Jahrhundert*）、《莱布尼茨与中国》（*Leibniz und China*）、《中国治外法权史》（*Zur Geschichte der Exterritorialität in China*）、《十一世纪中国文官职务的改革》（*Chinesische Beamtenreform im 11. Jahrhundert*）和《歌德与中国》（*Goethe und China*）等。几乎全都是文章，并且都刊登在当时在北京建立的中德学会主办的杂志《研究与进步》或《中德学志》上。^①

这两份杂志都是由福兰阁的儿子傅吾康（*Wolfgang Franke*, 1912—2007）主编的，最初叫《研究与进步》（*Forschungen und Fortschritte*），1940 年改版为《中德学志》（*Aus deutschem Geistesleben*），扩充篇幅，增订内容，专注人文科学的编译和论述，并增载关于研究中国学术的文章，前后 6 卷共 22 期，很受中国学术界的欢迎。在上述翻译作品中有不少是论述中国的，对于本书来说，具有一定的史料价值。

1949 年之后，在相当长的时期，由于多种原因，国内学界对西方汉学，包括德国汉学的研究，十分薄弱。对于福兰阁，也不见有人译介。直到 20 世纪 90 年代，才有人再度关注到这位外交官出身的汉学家。1994 年，张国刚在《德国的汉学研究》一书中独辟一章，专门介绍了《外交官出身的汉学家——福兰阁和佛尔克》^②。在有关福兰阁的章节中，张国刚简要介绍了福兰阁的生平，描述了他走上汉学研究之

① 《研究与进步》1939 年第一卷第一期、1939 年第二期、1939 年第三期；《中德学志》1940 年第一卷第四期、1940 年第二卷第一期、1940 年第二期、1940 年第三期、1943 年第五卷第三期。

② 张国刚：《外交官出身的汉学家——福兰阁和佛尔克》，载张国刚《德国的汉学研究》，中华书局 1994 年版，第 49—56 页。



路和写作五卷本《中华帝国史》的经过。到了1997年，张国刚又著文《从外交议员到汉学教授——德国汉学家福兰阁传》^①，更加详细地论述了福兰阁的生平著述。但也仅限于介绍，对于福兰阁的学术思想和观点，只是蜻蜓点水，几笔带过。

2009年，福兰阁的孙女傅复生（Renata Fu-Sheng Franke）将福兰阁在1888—1901年间所做的11次东亚旅行日记编辑成册，出版了《“异国啊，请预告我吧”——东亚旅行日记和照片（一八八八—一九〇一）》^②。李雪涛也发表了有关这本书的书评《行万里路，读万卷书》（上下册）^③。在这里，作者强调说，这11次旅行日记的出版为研究福兰阁提供了重要依据。“福兰阁以细腻的笔触描述了他在中国的见闻，为后来自己的汉学研究提供了最生动、最直接的素材，催生了德国学术汉学的诞生。从这一意义上讲，福兰阁的这部东亚旅行日记本身就是重要的汉学著作。”^④李雪涛认为，福兰阁在东亚的旅行日记中客观地描述了中国，记载了对中国的直接印象，把一个真实的中国展现在德国人面前，逐渐影响到德国人对东亚观点的形成。福兰阁眼中的中国与李希霍芬（Ferdinand von Richthofen, 1833—1905）^⑤眼中的中国是不同的。李雪涛的肯定性评价，代表了当代中国学者对福兰阁的比较普遍的认识。我们基本赞同这样一种认识，但也主张做更进一步的研究工作，更全面地阅读福兰阁的原著，更深入地探讨福兰阁的思想观点。2013年李雪涛又在中国社会科学报上发表《福兰阁与西方汉

① 张国刚：《从外交议员到汉学教授——德国汉学家福兰阁传》，载李学勤主编《国际汉学漫步》（下），河北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第839—865页。

② Renata Fu-Sheng Franke und Wolfgang Franke, *Otto Franke: Sagt an, ihr fremden Lande, Ostasienreisen Tagebücher und Fotografien 1888—1901*, Nettetal: Steyler Verl., 2009.

③ 李雪涛：《行万里路，读万卷书》（上、下），《读书》2010年第7、8期。

④ 李雪涛：《行万里路，读万卷书》（下），《读书》2010年第8期。

⑤ 李希霍芬：德国地理学家、地质学家，多次到中国考察地质和地理。他于1877—1912年撰写出版的《中国》（5卷，附地图集2卷）一书，是第一部系统阐述中国地质基础和自然地理特征的重要著作，并创立中国黄土风成的理论。



学的转型》^①一文，作者从汉学研究是通过历史文献认识当时的中国和汉学学术史本身就是范式转换的历史两方面肯定了福兰阁对当代德国汉学研究所做出的前瞻性的贡献，文中指出，福兰阁认为“要从历史文献的研究去认识当时的中国”以及当代汉学研究“应包括对当时中国的研究”，这两种观点在当时的西方汉学研究中是具有超前意识的。

除此之外，还有不少学者写作海外（或西方，或国外，甚或德国）汉学史，并且几乎都提到了福兰阁。这些著作多属教材性质，东拼西凑而成。据此，大体了解一下情况可以，细究起来，往往破绽、漏洞百出，不敢恭维。

（二）国外研究状况

与中国学者的研究状况相比，德国学界对福兰阁的研究要好一些。但也同样存在不少问题。

1933年9月，在福兰阁70岁生日的时候，申得乐（Bruno Schindler, 1882—1964）在《泰东》（*Aisa Major*）^②上发表文章^③祝贺他70岁寿辰。申得乐称福兰阁为“德国汉学家的前辈”，“德国的中国学必须要以福兰阁为荣”。福兰阁虽然年岁已高，但是他仍有旺盛的创造力，《中华帝国史》的出版就证明了这一点。申得乐是福兰阁的学生，况且是祝寿之作，溢美之词情有可原，但作为学术评论恐怕要打点折扣。

同样是为福兰阁贺寿，颜复礼（Fritz Jäger, 1886—1957）在同一

① 李雪涛：《福兰阁与西方汉学的转型》，《中国社会科学报》2013年5月22日。

② 《泰东》：1923年由申得乐创刊，是当时德国最权威的汉学杂志之一。1935年由于申得乐的犹太人血统被迫移民英国，1936年《泰东》杂志被肃清。1949年以后，申得乐在伦敦重建《泰东》杂志，1975年由于财政困难《泰东》停刊。1990年《泰东》在汉学家 Dennis Twitchett 的努力下在普林斯顿再次得以重建，从1998年至今《泰东》杂志迁至台湾出版。

③ Bruno Schindler, “Otto Franke—zu seinem 70. Geburtstag am 27. September 1933”, *Asia Major*, IX 1933.



期《泰东》杂志上发表了福兰阁的著述目录^①。其中福兰阁的著作和论文有196篇，书评78篇。之后他于1944年又在《泰东》杂志上对福兰阁的著述目录进行了补充^②。这个书目对于我们的研究工作非常有用。至于是否有遗漏，尚需做更深入的调研。

1946年6月5日，福兰阁病逝。他的学生福克司（Walter Fuchs, 1902—1979）在《燕京学报》上发表文章说“自福兰阁逝世，其最后目睹老大帝国与其所领导西洋汉学家同归于尽，同时现代西洋汉学与19世纪前辈大师之联系亦告中断”^③。字里行间痛悼先师之情令人感怀。

1947年，舍尼森（Beatus Theunissen）也发表了一篇纪念福兰阁的文章，并对福兰阁的著述情况进行了系统梳理^④。这种梳理对于进一步研究也是非常有用的。

1950年，颜复礼发表了一篇纪念文章《奥托·弗兰克》（*Otto Franke*）^⑤。作者高度评价了福兰阁的巨著《中华帝国史》。颜复礼认为福兰阁是“德国中国研究的巨匠”，“福兰阁拥有到今天为止还没有另外一个汉学家曾经拥有过的创作性地编写历史的天赋”。他认为，福兰阁的《中华帝国史》的两卷本注释更有价值，因为它不仅标示出了必要的史料信息，而且讨论了很多在文章中出现的问题，福兰阁一个人完成了需要很多研究人员才能完成的工作，《中华帝国史》应该获得荣誉席位。如果还有历史学家（比如兰克）认为，中国历史应该排除在世界历史之外，因为中国人没有为人类的进步发展做出过贡献，那么福兰阁的这部著作就会使这些历史学家相信，中国历史其实是“在总的人类历史发展中非常重要的、有借鉴性的、非常吸引人的一部分”。

① Fritz Jäger, “Bibliographie der Schriften von Professor Dr. Otto Franke”, *Asia Major*, IX 1933.

② Fritz Jäger, “Fortsetzung und Nachträge zur Bibliographie der Schriften von Professor Dr. O. Franke”, *Asia Major*, 1944.

③ 福克司：《德国汉学家福兰阁教授逝世》，《燕京学报》1947年6月刊。

④ Beatus Theunissen, “Otto Franke in Memoriam”, *Monumenta Serica*, XII 1947.

⑤ Fritz Jäger, “Otto Franke (Nachruf)”, *ZDMG*, Vol. 99, (1945—1949) 1950.